

編後語

在中國的大轉型中，經濟增長高速與社會危機四伏並存。當市場力量的大釋放為中國帶來快速的財富積累之時，由於政府轉型的滯後，致使公民社會發育遲緩，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危機層出不窮。在面對社會失衡的時候，轉型滯後的政府一方面大吃極權主義的老本實施壓制性「維穩」，另一方面秉持發展主義的思維開發出市場時代的新招，試圖用人民幣來解決所有「人民內部矛盾」。然而，無論極權主義與發展主義的兩手多麼硬，都無法直面社會危機的根源，即公平公正的制度建設在中國的全面缺失。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發了四篇文章「直面中國的危機」。中國的社會危機林林總總，但最為突出者則為族群衝突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民族認同危機。張健指出，自由民主制度的確有助於緩解族群衝突甚至更大的民族認同危機，但不幸的是，自由化、民主化的過程卻有可能帶來相反的結果。實際上，眾多涉及少數民族的社會衝突大多緣自政府在處理微小社會矛盾時的治理不公，解決之道正在於厲行法治或實施公共管理的「善治」(good governance)。無論是法治還是善治，都要求政府以一視同仁的方式面對所有公民，無論其民族為何。這才是直面民族認同危機的根本出路。

莊禮偉同樣指出，社會危機層出不窮的根源在於「正義缺失」，其結果就是塑造了一個「怨恨積聚的社會」。以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為目的的「維穩」機制，根本無法達致其目的，而社會危機的累積有可能演化為國家危機。治理危機的根本之道，就在於公民社會的建設，而公民社會的參與以及促成公民社會發展壯大所必需的國家制度建設，例如公開性、透明性、反應性等等，則恰恰就是善治的核心要求。在邵建看來，民間要維權，體制要維穩，權利與權力在角力。中國社會危機層出不窮卻並無緩解之勢的根本原因，在於權利維護和保障的渠道不暢通，機制不健全。這歸根結底還是憲政尚未落實的問題。

程平源展示了中國社會危機的另一種表象，即「為承認而鬥爭」。中國特有的身份制所造就的政治不平等，不僅加劇了經濟分配的不平等，而且導致了社會凝聚力的崩潰。身份不平等與權利無保障交織在一起的社會危機，再一次凸顯了正義在制度中的缺失。

本期還有一些文章論及中國制度建設的缺失。童建軍、馬麗的文章揭示，在中國著名旅遊熱點地區令遊人頭疼的當地農民道德失範現象，根源於當地政府對旅遊收益的分配不公，而面對制度缺失和施政不公的農民只能拿起一些令外界一頭霧水的「弱者的武器」。崇明的「短論」告訴讀者，在面對並處理一系列社會危機事件時，政府竭盡心力讓民眾忍受甚至忘卻苦難，而在重建社會的艱難道路上，來自民間的行動者正用一種奉獻和犧牲的精神來面對中國社會的苦難。